

· 国际关系理论译丛 ·



当代国际 关系理论

〔美〕斯坦利·霍夫曼著

Contemporary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国际关系理论译丛

2 017 6274 3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

〔美〕斯坦利·霍夫曼 著

林伟成 刘晓红

刘南平 译

王建伟 周科真

倪世雄 刘同舜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保平
责任校对: 徐幼玲
封面设计: 鹿耀世
版式设计: 王丹丹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
Dangdai Guoji Guanxi Lilun

〔美〕斯坦利·霍夫曼 著

林伟成等 译

倪世雄 刘同舜 校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社科保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2插页 289千字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7-5004-0673-8/D·54 定价: 5.70元

· 译 者 的 话 ·

翻译一部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著作，又难又不难。一方面，近20年来，这类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况学派林立，此说彼云，互有长短，实不知选哪家是好。另一方面，这类著作的中译本，也真是寥寥无几。近来，情况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国内不少学者和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介绍、评述的文章和专题学术讨论会也多起来了。根据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从令人目不暇接的西方国际关系著作中挑选和翻译了斯坦利·霍夫曼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供读者参考。

斯坦利·霍夫曼在谈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时说：“这门学科既年轻又古老。”说它年轻，是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至多不过70年左右的历史；说它古老，是说它的理论渊源流长，甚至可追溯到2000年以前，如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的战争历史观、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和以后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的国家学说等，他们的思想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然而，西方较为公认的最早一部国际关系专著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赖尼希教授的《在东方形势影响下的19世纪末的世界政治》（190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类书可谓凤毛麟角。此后，关于国际关系的文章和论著才渐渐多起来，大学里开始有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课程，专门的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国际关系理论才逐步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一般说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至50年代末，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论战；（二）60年代初至70年代，是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三）70年代后期至今，是新现实主义。

第一次论战与两次世界大战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因大国均势政策而维持的所谓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战争的惨痛后果却使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转向18世纪启蒙主义和19世纪理性主义。他们提倡道德准则，强调伦理作用，主张国际规范，要求建立诸如国联等超国家机构和组织，以形成稳定的国际社会，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重演。于是，理想主义学派就应运而生。所谓理想主义学派，其实就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搬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价值观来处理国际关系，它的政治代表人物即当时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西方，这一学派甚至被称为“威尔逊学派”。威尔逊1889年发表的《国家论》大谈“使国家和世界民主化”，国家关系应实现“道德理想”。他于1918年抛出的“十四点计划”，则被吹得天花乱坠，称为“世界和平的基石”，“理想主义的纲领”。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威尔逊理想化的民主共和国，其实就是最疯狂的帝国主义，最无耻地压迫和扼杀弱小民族的形式。”把威尔逊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化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有英国弗朗西斯·布雷德利的《哲学上的国家理论》、伯纳特·博赞克特的《国家行为的道德》和美国乔赛亚·罗伊斯的《忠诚的哲学》。这三部理想主义学派代表作的基本观点是：（一）认为精神和理想是最高的实在；（二）认为拯救世界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是“道德的原则”和“忠诚的原则”。

可是，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酷事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宣告了理想主义主张的破产，因为在国际事务上，道德伦理的说教无论如何抵挡不了权和利的诱惑。越来越多的学者于是认为，人类应当面对争斗的现实，不应陷入和谐的空

想。他们提出，外交的目的应是在国际舞台上攫取权势，国际关系应以实在的“权力”和“国家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抽象的“道义”和“民主”为中心，并且认为，权力政治只是不符合抽象的道德，却非常切合具体的国家利益的道德，他们还抨击理想主义侈谈道德规范，以致与你争我夺的国际关系现实情况背道而驰。现实主义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于本世纪30年代，发展于40年代，到50年代占据了统治地位。

现实主义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威尔士大学E·H·卡尔教授，他在1939年出版的《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概述》一书中提出了现实主义的三个重要观点：（一）权力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因素，一切政治活动都是权力活动；（二）有权力才谈得上道义和民主，道义和民主是相对的，是权力的产物；（三）归根结蒂，政治活动应是权力和道德的结合。卡尔这本书是第一部系统地用现实主义观点论述国际关系的专著，是现实主义学派形成的标志。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对现实主义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大战的严重破坏，以及战争期间大批著名学者横遭迫害而逃亡或移居美国（如摩根索、霍夫曼、多伊奇、基辛格等），战后美国又成了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这些使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就从西欧移到了美国。正如霍夫曼所说：“卡尔的最初努力未能在欧洲生根，反而在美国开花结果。”

战后，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异常活跃，现实主义学派取得绝对优势。这一学派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尼布尔、斯巴克曼、赖特、摩根索、沃尔弗斯、琼·赫斯、厄恩斯特·哈斯、凯南和基辛格等。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美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神学家和政治哲学家，曾任美国神学院副院长。他的代表作《基督教义和权力政治》（1940）和《基督教现实主义和政治问题》（1953）把西方流行的基督教教义运用到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所以，他的理论又被称为“基督教现实主义”。他的主要观点是，人有

原罪，人的“生存意志”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力的意志”；国家的权力便是这种意志的扩大。尼古拉·斯巴克曼原是耶鲁大学教授，他以强调国际关系的冲突因素著称，其代表作是1942年出版的《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策略——美国与权力均衡》。斯巴克曼认为，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决定因素，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攫取和保持本身的权力地位。他还认为，地缘政治和权力均衡是现实主义的两个理论支柱，据此，他得出一种“边缘地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立，美国应转向欧亚，维持在那里的权力地位，以阻止苏联、中国等大国在欧亚大陆扩张。这实际上是凯南“遏制”理论的先声。现实主义学派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要推原芝加哥大学教授汉斯·摩根索，他于1948年发表的《国家间政治》被视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著作（此书重版六次，1985年又出了一次修订本）。全书分十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摩根索在书中提出现实主义的六项原则，强调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应以权力来规定国家利益，维持均势只是手段，争夺权势才是最终目标。至此，摩根索把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对现实主义学派和整个西方国际关系的研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怪霍夫曼说道：“如果我们这一学科有奠基之父的话，他就是汉斯·摩根索。”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代表人物是原耶鲁大学教授阿诺德·沃尔弗斯，其代表作是1962年出版的《纷争与合作》，该书扉页上写着“为纪念朋友和同事斯巴克曼而作”。尼布尔作序称颂沃尔弗斯是“政治哲学领域中的一位可敬的先驱者和带头人”。沃尔弗斯在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在现实主义学派中独树一帜。如他认为一国对外政策的依据是国家利益，基本目标应是权力的“自延、自保、自制”，即扩张势力——自延，维持现状——自保，重视国际安全胜于国家安全——自制。至于乔治·凯南和亨利·基辛格则是我们熟知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外交家，前者以“遏制”政策、“冷战”

理论闻名全球，后者以“均势战略”、“穿梭外交”蜚声于世。他俩的共同特点是，都曾身居政府对外事务的高位，最能直接地把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国家利益”原则运用于美国对外交往的实践。

到60年代，现实主义学派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优势地位遭到了挑战。这一方面是由于现实主义学派对于概念问题，诸如什么是“国家利益”，规定得模糊不清，其方法也不甚精确，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那时国际力量对比格局起了很大变化，参与和影响这一格局变化的角色和因素日益众多和复杂，西方国家的对外关系实践在很多方面显然无法用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加以概括。一批提倡“以科学行为主义新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掀起一阵新的理论攻势，另一批自称“捍卫传统的现实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学者则摆开阵势沉着应战，形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新的理论对峙。这就是第二次论战：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

这次论战是前次论战的继续。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学科的互相渗透，电脑的广泛运用，不少中青年学者，如卡尔·多伊奇、莫顿·卡普兰、大卫·辛格、霍华德·阿尔克、哈罗德·喀茨柯、詹姆士·罗森诺、布鲁斯·鲁塞特、黛娜·津妮斯等，开始运用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手段和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他们把盛行于20年代的政治学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稍加改造，引进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自称为“科学行为主义学派”。该学派着重研究人的行为而非意识，强调国际关系的数量分析，而非事件的历史分析；强调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如变素分析法和模式分析法，而不是清一色的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论。坚持传统主义的学者，如肯尼思·华尔兹、英利思·克劳德、卡莱维·霍尔斯蒂、斯坦利·霍夫曼、查尔斯·麦克莱兰和弗雷德里克·邓恩等则认为，哲学、历史、法律仍是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现实主义的历史研究较之科学行为主义种种花样翻新的方法更富有逻辑性，更符合客观实际。他

们批评科学行为主义过于强调方法论而忽视了国际关系的理论阐述。彼此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但却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空前活跃起来。

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卡尔·多伊奇。这位捷裔学者最有影响的专著是1968年出版的《国际关系之分析》。该书提出的三种研究方法——一体化、相互依存和博弈论（总称为多伊奇的“联系理论”），奠定了他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的重要地位。多伊奇认为，现实主义学派过分地强调均势，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特别在力量不均衡的情况下，集体安全与一体化比均势更为重要。多伊奇还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能再以国家为中心，要重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关系，他是最早把“相互依存”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的学者之一。多伊奇还认为，随着各种学科互相渗透的逐渐加深，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学科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他在1973年和1976年分别出版的《国际政治与数学方法》和《政治的数学分析》两本专著，广泛运用数学原理研究国际关系的诸因素、行为者、体系和结构等。行为主义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莫顿·卡普兰，他的成名作是1957年问世的《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卡普兰从宏观角度提出国际体系的六个模式：权力均势体系、松散的两极体系、牢固的两极体系、环球体系、等级制体系和单位否决体系。在这六个体系模式下，又引出一些分模式，如非常松散的两极体系、缓和体系、不稳定集团体系等。卡普兰综合科学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第一次系统地国际体系的结构、职能、客观环境和行为者关系变化等方面剖析了六个基本模式，这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是一次新的尝试和突破，颇有影响。

在60年代，当国际关系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纷繁复杂的现象时，行为主义学派提出的各种另辟蹊径的研究方法，使人们耳目为之一新。这一学派公开宣称他们无意创建一套囊括一切的

“终极理论”，他们提出的种种方法，只是为了帮助人们到达理解国际关系的彼岸，这就击中了现实主义学派在理论上不够周密精确，方法上因循守旧的要害。在科学行为主义学派提倡方法至上的影响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派宛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从此，这一研究领域再也不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的独占领地了。

但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学派仍有它的代表人物。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肯尼思·华尔兹便是其中的佼佼者。1959年，当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时，他发表了《人、国家和战争》，提出关于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所谓“华氏三原理”。他认为，战争的根源是：（一）人的自私和权欲，只有改变人的这一恶性才能避免战争；（二）国家体制不善，以致转嫁危机，导致冲突，因此，要防止战争就须从改善国体着手；（三）国际上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世界上至今缺乏一个能制止战争的超权威组织，对此，华尔兹主张成立世界政府，在成立之前应尽力维持均势，确保和平。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传统派学者是英利斯·克劳德，他1962年发表的《权力和国际关系》是传统主义学派关于均势理论的一部重要著作。克劳德围绕权力的运用，详尽地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三个基本概念：均势、集体安全和世界政府。他认为，就权势的集散而言，均势表示权力的分散，集体安全是权力的部分分散，世界政府则表示权力的集中。克劳德关于以上三个基本概念的分析代表了传统主义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有它的独到之处，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注意。

到70年代，科学行为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战虽仍继续进行，但双方均已失去往日的锐气。特别在美国，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对苏优势的丧失，越战带来的后遗症，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一批学者则要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败原因及教训进行审查。长期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现实主义理论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科学行为主义层出不穷的方法也解决不了调整中的种种问题。于是，有人出来对传统的现实主义作“科学的修正和补

救”。这一经过改造的现实主义被称为“新现实主义”，又叫“当代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它是前两次论战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它以“权力”和“国家利益”为轴心，对现实主义进行修补。推崇“新现实主义”的学者提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内容应比过去广泛，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除了权力政治之外，经济、伦理问题也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也必须多样化，结构分析与博弈反馈，复合相互依存与宏观微观国际经济关系等都应兼收并蓄，相互渗透。比较集中体现新现实主义观点的著作可列举以下四部：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从结构功能的角度分析权力均势和经济关系；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存》（1977年），把权力政治与相互依存结合起来加以研究，首次提出“复杂的相互依存”的概念；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年），提出世界政治的三个体系理论（西方、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罗伯特·吉尔本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和变革》（1981年），通过经济关系和利益选择理论分析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变化。

可见，所谓“新现实主义”实是在方法上吸收了科学行为主义之长，在内涵上稍有扩大的现实主义。然而，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理查德·阿希勒在《国际组织》杂志1984年2月号发表题为《新现实主义的贫困》的长篇论文，指责新现实主义背叛了现实主义的 tradition，是名实不符的冒牌货。阿希勒认为，新现实主义主张“国家主义、结构主义、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是犯了“一系列理论上的错误”。新现实主义把政治实践降为经济模式，而这种政治理论经济化的结果却是否定了政治；新现实主义的机械方法论使国际关系的科学变成工具性的技术，所以说，“新现实主义”背叛了现实主义的 tradition。在同一期的刊物上，罗伯特·吉尔本等三人分别撰文进行反驳。吉尔本等人指出，阿希勒七十多页的冗长文章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误解”，

是对新现实主义的“偏见”，是阿希勒本人“历史近视和理论贫困的表现”。吉尔本认为，新现实主义强调经济关系是新形势的需要，强调权力和安全是人类的根本目标，体现了历史的必然，只有新现实主义才能使国际关系学扎根于国际关系的现实基础上。这一争辩是否就是下一场论战的序幕，情况如何，影响多大，有待时日，我们似应密切注意，加强研究。

本书作者斯坦利·霍夫曼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28年11月27日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948年毕业于法国巴黎政治研究学院，1952年在哈佛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又取得博士学位，1955年加入美国国籍。从1956年起，除1965至1966年在斯坦福大学之外，他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现任该校西欧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国政治学学会和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成员。他的主要著作有：《战争状态》（1965年）、《格利佛麻烦——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1968年）、《国际秩序的条件》（1968年）、《衰落，还是复苏？》（1974年）、《统治权，还是世界秩序——冷战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1978年）、《超越国界的责任》（1981年）等。

霍夫曼是美国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沃尔弗斯和法国传统主义大师雷蒙·阿隆的学生。他自称是阿隆的“忠实信徒”。他特别推崇阿隆的《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和华尔兹的《人、国家和战争》。霍夫曼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进一步阐发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一）世界政治充斥着反复的冲突和纷争，冲突是长期的，往往捉摸不定；由于缺乏制止冲突的国际权威，诉诸武力是常有的事。（二）国际关系理论应面对冲突和纷争的“现实”，研究影响国家权力和对外政策的特点和活动，寻找制止冲突、维护和平的途径。（三）主张用“历史”和“现实”方法分析均势和国际体系。他认为从过去的“五强均势”（英、法、俄、普、奥匈）到今天的“五角均势”（苏、美、中、日、西欧），情况有很大的变化。过去的均势有一个唯一的中心平衡

者，呈现为简单均势；而今天的均势则是复杂的均势，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全面展开，并带有核竞争、核对峙的特点。他提出国际体系的两种类型：温和（均势结构）型和革命（两极结构）型，国际社会的目标是建立温和的国际体系，手段则是发展国际组织，应重视国际组织在维持和平中的作用。（四）他认为，传统的道义选择应以“安全、生存”和“相互依存”为原则，以符合“国家利益”为标准；国际关系的伦理问题与人权、非武力和世界秩序密切相关。因而霍夫曼认为，美国进行越战，苏联入侵阿富汗，都违背了国际关系的伦理准则。（五）在阐述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时，霍夫曼一方面肯定了科学行为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有若干可取之处，同时抨击多伊奇的联系理论是“肤浅的量变理论”，指出卡普兰的系统理论偏离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正确方向，是“一大失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作为传统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关系理论从传统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我们翻译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是霍夫曼早年的成名之作，第一版于1960年出版。在这部文选中，入选的均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作品，编排得当，删节有宜，无断章取义之弊，具博采众家之长，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英、美、法一流学者的观点，特别是霍夫曼为该书撰写的三部分评述，不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论战作了出色的总结，还对国际关系理论今后的发展作了比较客观的预测。二十多年来，这本书影响不衰，至今仍为西方学术界所推崇。

本书根据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市格林伍德出版公司1977年版本译出。参加本书翻译的有林伟成、刘晓红、王建伟、周科真、刘南平，负责校译的是倪世雄、刘同舜。限于水平，译文错误和欠妥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教。

1985年1月

· 序 言 ·

在最近20年里，国际关系的研究在美国发展得相当快。关于各种各样问题的教科书、理论文章和专题著作数量不断增加，许多关于当前国际问题和19世纪外交的分析，以及对各种主张不一的政策的研究——所有这些使得国际关系这门学科成了过于拥挤的“购物中心”，这与大学政治系开设大量与政治学科毫无关系的课程的情况非常相似。

这种纷繁复杂的发展情况使我逐步产生了两种想法，促使我编著这本书：一是对国际关系学目前状况的不满；二是希望找到一种更有成效的研究方法。我深信，我们学科的许多问题只有通过做比过去更加系统的研究，才能获得解决。我想大多数学者也会这样认为的。这本书要求人们把理论当作一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加以认识，以此来引导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的研究深入下去。

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三个部分。一个方面是文选：论文或专著的节选，它们提出了国际关系学的一般问题，讨论了理论的需要，表述了当前在理论上应该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对这些不同问题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试作评价，还就研究方向谈了我的一些建议。因此，结果有点奇异：文选的编者有时候竟相当严厉地批评起他所选的文章来了。

本书第一部分是关于是否需要理论的争论，涉及国际关系学的范围和目的等一般问题。第二部分提出并讨论了当前该学科一般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三部分提出了关于如何作出较明确和更满意的努力以形成理论的建议，其中包括在我认为对该学科

发展有关键意义的领域里开展系统研究的初步计划。在每一部分，读者将先读到我的评述，然后读到一些文选，最后是书目。

本书的许多讨论如同大多数社会科学一样涉及到方法和目的的问题。正因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情况比大多数社会科学更糟，这些问题在这里就显得特别重要。

本书自始至终强调把国际关系领域看成一个整体，所以没有关于具体方面内容的研究（如某些国家的对外政策，民族主义现象，国际组织），也不涉及仅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里某一狭小范围的理论（如国际法理论或帝国主义理论）。有一些文选看上去好像只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部分（如战争与和平问题），但这并不是一种例外，因为关于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是当前国际关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本书也没有试图详尽地讨论各种学科（根据最近一次调查，其范围为从文学批评到技术）能够对国际关系领域作出的各种贡献。

无论在所选的阅读材料里，还是在我的评述中，本书都没有试图对国际关系学核心的实质性问题答案进行讨论或陈述建议，如国家利益的性质、国内事务对对外政策的影响、意识形态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或者冷战怎样才能获胜（或结束）。本书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人们应当怎样研究世界政治？”因而本书对实质性问题的考虑或是偶尔涉及到，或仅仅是为了研究国际关系才值得对这些问题予以特别注意（如第三部分的一些文选），而不管人们对这些问题所提到的各点有什么看法。

由于本书仅仅探讨当代理论，对过去不同流派的政治思想家的理论就未作详尽的研究，尽管他们的理论（在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两方面）对了解国际政治是有益的。这点在第三部分的评述和文选里作了特别的强调。同样地，本书虽提及了在19世纪思想史上和20世纪部分世界政治（在像威尔逊这样的代表人物的影响下）中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关系的自由派理论，但没有加以详尽的

分析。

最后，本书只是对那些用合情合理的系统的和明确的方式提出的理论进行了研究。国际关系学或政治哲学的许多著作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但含蓄的理论，应该有另一本不同类型的书来完成这一任务。读者可能找不到任何一本表述目前国际关系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因为自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发表以来，苏联的理论研究一直弄得支离破碎，并且随着政治需要和策略考虑而变化无常，甚至出现180度大转弯。

收入本书的阅读材料尽力做到少而精，有的全文重印，有的略有删节，有的是原著的长段节选。我没有选择大量的短文。我力图为读者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文选，同时避免我先前批评过的“购物中心”的情况。

出版这本书的想法最早是李纳德·哈蒙兹先生提出来的。我要感谢哈蒙兹先生和普林迪斯·霍尔出版社的艾尔·古德伊尔先生，他俩提供了有意义的评论和合作。我还要深深感谢索蓬纳大学雷蒙·阿隆教授，对他我是非常钦佩的。此外，我也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助理研究员英奇·施奈尔小姐，她对本书第三部分所讨论的各点提出了极有帮助的建议。最后，我要感谢《世界政治》杂志的编辑，承他们善意的允许将我在该季刊1959年4月号上的一篇文章（《国际政治学：通向理论的漫长道路》，《世界政治》第11卷，第3期，第346~377页）的主要内容写进本书。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言	(1)

第一部分 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

一、评述	(3)
(一) 关于一门独立的学科	(3)
(二) 有关范围、方法和目的的问题	(7)
二、文选	(18)
(一) 弗雷德里克·邓恩：国际关系的范围	(18)
(二) 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	(22)
三、参考文献选目	(35)

第二部分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

一、评述	(39)
(一) 关于一系列答案的理论	(40)
(二) 提出一系列问题的理论	(51)
二、文选	(70)
(一)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	(71)
(二) 汉斯·摩根索：又一次“大辩论”： 美国的国家利益	(92)
(三) 雷蒙·阿隆：寻求外交事务哲学	(100)
(四) 肯尼思·汤普森：汤因比与国际政治理论	(113)
(五) 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	